

乡土黔北 牧之

土城走笔

(下)

(六)

我在走访中了解到,因为这里以前的房屋建筑都是“泥土墙基”,便得名土城。然而,现在展现在我眼前的老城,砌成的墙大多用的是木骨竹筋,就连墙角的堡坎都是用条石砌得整整齐齐的,哪有半分泥土?

当地老人说,土城以前用泥土来筑城,是源于祖辈们饱含智慧的“就地取材”,后来土城因为商贸繁荣兴旺,外地随船而来的石匠、木匠多了起来,他们带来了新的房屋建筑理念,受其影响,土城的房屋建筑才开始慢慢变成使用砖石竹木。

随着不断变化和传承,土城名字里的“土”字,倒幻化成了土城最本真、最自然的提醒:无论后面的岁月发生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城,还是那个骨子里离不开土地的土城,还是那个靠着赤水河不断日新月异土城。

岁月与历史总会在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发展和变化,土城也不例外,它因“川黔锁钥”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演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在明代,土城已经有了九龙屯、七宝屯、金子屯、天赐屯等屯兵之地,而真正让土城声名远扬的,还是9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长征过土城的红色历史。

(七)

1935年1月24日,中央红军在寒风凛冽中进入土城,他们在长征中面临着国民党重兵不断的围追堵截。1月28日清晨,红军在青杠坡的枪声撕破了笼罩着土城的层层雾霭。因对敌人情报判断失误,红军原来制定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歼灭战”计划,逐步演变成一场实力悬殊的“拉锯战”。在这场残酷的“拉锯战”中,英勇的红军战士们怀着向死而生的信念,与川军展开殊死搏斗……

我站在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向牺牲在青杠坡战役的红军烈士默哀致敬,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随行的烈士陵园一位管理员告诉我,听当地老辈人说,在青杠坡战斗的那一天,红军杀敌的冲锋号一次又一次响起,红军战士们前赴后继冲向敌人。战斗打到下午后,毛主席站在一个山坳里,望着对岸不断前来增援的敌军,突然大手一挥,说道:“不能硬拼,撤。”

是呀,一个“撤”字,藏着比“战”更难智慧,藏着一个更高瞻远瞩的预见。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央主力红军在赤水河的浑溪口架设浮桥。那些相信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船帮老舵工们划着船赶

来浑溪口,他们把带来的竹筏和门板为红军搭起了浮桥,枪声、炮声不断在赤水河浮桥边上响起。英勇的红军战士最终通过浮桥踏上对岸,走向新生。

1960年,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对毛主席说:“您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回答,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是的,红军从一渡赤水到四渡赤水,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突破敌人一次次设下的陷阱,在绝境里寻找生机,从胜利走向胜利。

90年,在岁月的长河里如弹指一挥间,青杠坡战斗的烽火硝烟已经随时光散去,但土城这片鲜血染红的土地却永远铭记着红军战士们一次次激越的号角。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无不浸染着红军先烈的顽强斗志与不屈精神。

(八)

如今的土城,已成为人们向往的红色圣地。在土城,只要你走进四渡赤水纪念馆,丰富的历史资料,会向你生动再现红军长征在土城的历史。

那一幅幅弥足珍贵的黑白照片,那一件件带着厚重历史印记的



三坝村风光

盛朝友 摄 (遵义图库发)

岁月留痕

梁卓

情系茅草铺

在我心中,有个地方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在岁月的长河里,承载着曾经的梦想和希望——它,就是遵义茅草铺。

那是1985年金秋九月,我们怀揣青春梦想,带着山里的泥土芳香,带着丰收的喜悦之情、美好的憧憬,告别亲人的千叮万嘱咐,迎着朝霞,坐上汽车,驶出大山。我们从大娄山下、诗乡茶海、尹珍故里、芙蓉江边、赤水河畔、仡佬古寨,四面八方汇集茅草铺——遵义师范学校。在这里,度过了我们人生难忘的快乐、学习、生活、成长的三年。

一路进校园,映入眼帘的学校新办公楼、新教学楼、新学生宿舍、新师生食堂,地面全是毛石铺就:教学楼旁还有一片茅草地和一户未来得及搬迁的农户。看得出,学校的相关配套设施还在持续完善中。

当时的遵义地区为大力培养紧缺的全科型农村小学教师,较大规模集中兴办四所师范学校,除遵义师范学校外,还有南白师范、仁怀师范、凤冈师范三所学校。我们就是遵义师范学校第一年招收的学生。全校八个班级,每班46人,共有380余名在校学生。学校计划三年招收24个班级,学生达1100余人。

我们这批学生都是当时班上成绩比较优秀的,算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也是为了早日跳出“农门”,减轻农村家庭负担。进入师范学校,已迈入了人生的起点,面对新环境、新学

习、新挑战,我们不但要学好文化课程,更要学好音乐课、美术课、体育课等知识,如此,方能走上农村小学教师的岗位。于是,在紧张、活泼、进取、拼搏的种种情景下,我们开启三年学习的旅程。

一首《山乡小渡船》歌曲,正式开启了同学们系统学习音乐知识的大门。这首歌曲是我们四班班主任张黔生老师教唱的,他唱得深情动听、扣人心弦,仿佛置身于大山深处一只摇动的小船,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载着一群求知孩子驶向远方的美景中。

张老师其实是上我们班政治课的,他多才多艺、严谨博学,对学生严管厚爱,且为人师表,深受同学们爱戴。如今,虽然他已光荣退休,我们的师生之情却从未中断。

后来,音乐老师系统地给我们讲了简谱、五线谱、节奏与节拍、音程和弦等音乐知识,我们围绕“吹拉弹唱”进行学习,即吹口琴、吹笛子、吹箫、拉手风琴、脚踏式风琴、弹吉他、唱红色经典歌曲等,如《黄河大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在教室、寝室、校园随处可听见歌声、琴声和各种乐器声,将校园汇集成歌声、琴声的海洋。

记得我们同寝室有位痴迷吹笛的室友,晚上时常在寝室“演奏”,影响大家休息,有一次趁他外出,室友就把他的笛子藏了起来,他晚上回来没找着,从此以后晚上就没有听

到他的“演奏”了。我们不但在学校练习吹拉弹唱,寒暑假回家也在家吹口琴、吹笛子、哼歌曲,真是笛子不离手,曲子不离口。

毕业前,我们班杨帆同学创作了一首歌曲,由全班进行演唱,在参加学校举办的歌咏比赛中得到好评。

美术知识的学习也在紧张进行,美术老师教我们学习线条、色彩、素描、写生等绘画知识,记得我们第一次学画的是火柴盒,大部分同学都画走样了。后来我们反复练习人物写生、练习画山水、练习画水果、练习画山村自然风光、画校园、画城镇等水彩画。我们不但在课堂上练习画,还利用周末课余时间,背着画夹,三五几个同学在校园角落和野外写生。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的画画知识和技能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幅度提升,毕业时画有所成。

劳动课主要是用我们自己带来的锄头,挖掉教学楼旁边那片长满茅草的荒地。我们8个班的学生大概用了大半学期的时间挖掉了那片茅草地,平整出了体育场地。

有了这个体育场地,我们体育课也开展得风生水起,体育课老师教我们田径类的短跑、跳远、投掷,球类篮球、羽毛球、广播体操等体育知识技能。同学们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体育赛事活动,课余或周末的运动场上时有同学们激情挥洒汗水的身影。

我们的文学爱好也得到培养锻炼。那是读师范二年级时,上我们班

《文选和写作》课的刘大林老师,他在读贵大时就在《山花》《贵州日报》发表了大量诗作,是贵州省小有名气的诗人。在他和张黔生老师的大力倡导下,加上我们几个文学爱好者的积极筹备,成立了遵义师范“雏鹰文学社”,同学们踊跃参加,首批会员五六十人。成立当天,校领导还和会员们合影留念,学校也专门为文学社提供了办公室。刘大林老师为文学社办报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他为报纸取名《蒲公英》,并题写报名,还负责会员稿件的修改、审核及把关,他和蔼、慈祥,他的轻言细语如同春风话语滋润着文学幼苗的成长。

张黔生老师为解决办报经费不足,提供了一批《读者文摘》等书刊,在学校门卫室设点零售,文学社赵嘉等骨干社员常为办报画版、刻写蜡纸,文字校对、油印报纸、分发报纸等工序挑灯夜战。每一期《蒲公英》,刚印出的报纸,散发浓浓的墨香味,每一份报纸都凝聚着两位老师及全体会员的心血和智慧。

文学爱好者们在这块园地耕耘收获满满,有的文章还被学校广播稿采用,在文学社的锻炼,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文字表达和写作能力,使我们终身受益。

时光飞逝,转眼三年过去,我们好似大山深处的雏鹰,在遵义师范母校汲取了阳光雨露般的营养,羽翼渐丰,如归巢雄鹰般展翅飞向生养自己的故土,去实现人生的梦想。

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如田间老农的俚俗之语,却道破了记忆与存在、思想与物质之间最本真的辩证。再聪慧的头脑,其记忆也如流云,易散难寻;再澎湃的思绪,若无凭依,终将归于虚无。于是,我便习惯了依凭这“烂笔头”记录琐屑的日常,在片纸方寸之间,进行一场最忠实、最私人的耕耘。

选择“烂笔头”作为展名,并非谦辞,亦非自嘲,而是对自身书写甚或对日常存在本身的一种理解。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所谓的展览,便是我试图为这种理解所作的小小注脚。

有幸抑或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记忆如此不可靠的时代。脑海中的波澜壮阔,终会褪色为模糊的轮廓;片刻的洞见与狂喜,如流星划过意识的夜空,徒留一道难以追溯的光痕。思想是流云,情感是流水,而“我”这个容器,却布满漏缝。于是,我渐渐选择、习惯、喜欢、信赖进而依凭这最朴素的动作——“烂笔头”般的日常书写,让思维的抽象,在笔尖与纸面摩擦的瞬间,获得物质的形态与重量。

“烂笔头”,于我自身而言,是对抗时间流逝的微小仪式,是向虚无投递的、方寸之间一页页有迹可循的“物证”。

“烂笔头”首先是一种书写和生活的姿态,一种对抗遗忘与虚浮的实践者姿态。不追求工具的华贵,不标榜场合的庄严,它可能是一支用了多年的秃笔、一方随手拈来的残纸,是工作间隙信手的勾勒,是夜读兴至时的即兴挥毫,是百无聊赖间的寄托与宣泄。在这里,“烂笔头”褪去了艺术那层令人望而生畏的神圣光环,将其还原为一种如呼吸、如饮食般的日常必需。如前所言,于我而言,这无疑是我个人对于时间和虚浮的一种微小抵抗。

在一个追求效率、速度与眼球经济的时代,深度阅读与沉潜书写,近乎奢谈。图像爆炸、信息碎片,我们习惯了吞嚼与遗忘,感官日益钝化,而“烂笔头”般的日常书写,是一种缓慢的、专注的、重复的劳作。它要求你与材料对话,与内心的节奏共振。每一次拇指上的“耕耘”,如同农夫面对土地,看着思绪化为可见的形迹,情感找到物质的依托,便是一个沉思、整理、发现的过程。我常常在看似无序的涂写中,瞥见自己都未曾明察的心念;在反复的摹写中,体悟到与古人之心的悄然暗合。这并非怀旧,而是为了在喧嚣中,试图去保持一种内在的清醒与独立。当然,我也知道,也许这只是徒劳。

故作深沉地讲,“烂笔头”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人“在路上”的精神哲学。它不追求结果的完美与不朽,而是拥抱过程的生成与流转。中国美学推崇的“屋漏痕”“锥画沙”,其魅力并不在于那历经时间、自然而然的痕迹吗?那是一种“非意图”的美,是物质材料在规律与偶然的交互中绽放出的本真状态。我的日常书写,便是这般践行,路虽漫漫,其修远兮。我珍视那些草稿上的“失误”、信笔的涂鸦、阅读间隙的批注。它们未经精心设计,却往往最贴近思维的原貌与情感的体温。在这种看似“烂”的、不完美的状态里,反而蕴含着最大的自由与真实——一种摆脱了“杰作”和他人重负后的、创作本身的欢愉。

在这一点上,它比记忆更诚实,比语言更直接。此时,夸张点讲,笔已非工具,而是神经的延伸;纸亦非载体,而是与世界交锋的战场与田园。每一笔落下,都是一个“此刻”的诞生与凝固。这或许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海德格尔所言“诗意地栖居”——我并非先有一个完整的内在,再将其表达于外;恰恰相反,我是在这连绵不绝的日常书写中,才逐渐塑造并认清着这个“我”。我不再试图炫技、造作、迎合和顾虑其他,也不再奢望成为他人认可或重视的“艺术家”,而只是在这笔墨中见到一个真实活着、思考着、感受着的自己。存在,于这日常书写中证得澄明。

当然,“烂笔头”也可以看成是我个人审美的转向。友人笑言我“中年变法”,除了对“中年”二字无可奈何苦笑之外,我对“变法”二字也不敢领受。自我反思地看,随着年岁渐长,人到四十,就像大树到了秋天开始摒弃多余的落叶,我们也开始做减法般的筛选和删除,这也是个人审美取向的一种变化。

在我看来,艺术或可粗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他人的艺术,它面朝公众,承载着表达、沟通乃至教化的使命,其光芒旨在照亮他者;另一种是为自己的艺术,它向内烛照,如同夜阑人静时与自己的一场对话,其意义首先在于滋养与安顿创作者自身的灵魂。而这“烂笔头”的日常书写,如果勉强算成艺术,大抵便属于后者——它是我在喧嚣尘世中、忙碌生活间、孤独彷徨时,为自我开辟的一座后院,一个不待外求、旨在愉悦自身的行动。我不敢说这愉悦是否浅薄,也不敢自诩为深沉的、哲学意义上的享受,诚实地讲,每一次书写,并非要创作一件预备接受审视的“作品”,而是在进行一场纯粹的自我徜徉:疾缓、方圆、大小……全然听从那一刻心绪的流淌。在这一过程里,没有“画眉深浅入时无”的顾虑,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抱负,也没有“料青山见我如如是”的多情,有的只是一种心手相映、笔意相合的自主与自由。也正是这自主与自由、从容与真实,带给我无数个瞬间无上的愉悦。

一个搞哲学的朋友讲:“这种为己的艺术,其核心是一种‘无目的性的目的性’。它的目的,就在于书写行为本身所带来的内在满足。好比林间鸟儿的自啼、山涧清泉的自流,其存在本身,便是意义与欢愉的完满。”人总是喜欢溢美之词,对此谬赞我也颇为受用。我喜欢“无目的性的目的性”的说法,虽然很绕口。在“烂笔头”的世界里,我得以从“他人怎么看”的重负中解脱,回归到一个纯粹的“书写者”。我可以允许“败笔”存在,甚至欣赏那种丑拙夸张的意外之趣——那或许是理性规划之外的、潜意识悄然浮现的痕迹。这种对“不完美”的包容与玩味,本身也许便是一种随着年岁增长的包容和自身对于宽恕的践行。

“烂笔头”一词本身便是谦辞,亦是勉励,更是一种深沉的智慧。它承认个体的有限,故而激励我们勤勉不辍;它拥抱生活的琐碎,进而让日常生活生机盎然。在信息爆炸、图像泛滥的今天,我们习惯于快速地摄取与遗忘,而“烂笔头”所代表的那种缓慢、专注、与物为春的书写方式,自然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真正地文为艺,往往源于持续的、诚实的劳动,源于对手中平凡事物的深情与敬意……

因此,“烂笔头”本身是一种向往。“烂笔头”不烂!“烂笔头”不朽!

娄山危言

陈义望